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学术研究丛书

石兴邦

著

石兴邦考古论文集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学术研究丛书

石兴邦考古论文集

石兴邦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ZH14N17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兴邦考古论文集 / 石兴邦著. — 西安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5.1

ISBN 978 - 7 - 5613 - 7830 - 4

I. ①石… II. ①石… III. ①考古—中国—文集
IV. ①K8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4225 号

石兴邦考古论文集
石兴邦 著



选题策划 / 郭永新
责任编辑 / 郝宇变 郭永新
责任校对 / 梁 菲
素描画像 / 蔡昌林
封面设计 / 屈 昊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37.5
插 页 / 4
字 数 / 660 千
版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613 - 7830 - 4
定 价 / 350.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85303879



前言

我于1923年11月10日在今陕西耀州区石柱镇故县村一个普通农家中出生。由于我从小比较喜欢读书,家里便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勤学”。在县城大成街小学上高小时,起了个官名叫石兴业,即振兴家业的意思。当时校长任侠生先生说:光顾家不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就叫“兴邦”吧!从此,这个名字成了我终生奋斗的目标。小学期间在家乡是在牧羊和农活中度过的,所以我也练就了一身爬山越岭、吃苦耐劳的习惯。由于当时的县城连一所初中都没有,14岁的我就只能去西安一中求学。陕西的历史地位是出英雄豪杰的舞台,也是出圣贤学者的庙堂,对我感触颇深的是在西安一中那一学期所受的教养。学期开学,级任老师等先给学生讲校歌,其辞曰:

一中,一中,可爱的一中!

荟萃三辅之精英,

锻炼体魄,修养学行,济济一堂,乐融融!

关学重实践,驹铁美秦风,

好青年,好学生,远道任非轻。

莫让那,交趾立柱,燕然勒铭,千载独光荣!

勉负历史使命,争为民族英雄。

一中,一中,可爱的一中!

这一年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轰炸西安的原因,西安一中迁往汉中,我便转学到离家近一点的三原中学。初中时期,我和几位青年倾心新文化运动中的创造社派,得到校方的支持和鼓励,毕业时以全级第一名,免试、免费升入高中部。在学校和老师的关心和资助下,我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1944年,我在陕西省高中会考中夺得第一名,省上根据本人志愿,由省里向教育部呈文,教育部再根据考生的成绩分往全国各大学。我就被分到了南京的中央大学边政系(将来从事边疆地区行政工作的专业),这正合我想立功边疆的志趣。边政系下设三个组:蒙、维、藏。我被分在蒙语言这一组,重点

学习蒙古族语言、回族史及相关的专业知识。因为边政系属法学院,所以除民族学、民族志、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专业课外,还增设法律、政治、经济、行政管理、西洋史等课程。我除完成专业课外,还抓紧时间到外系去旁听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因为我的学业较为优秀,所以没毕业就在系里当了预备助教,这当然是受到系主任韩儒林先生器重的原因。这些为我后来从事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知识储备。

1949年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中央大学易名为南京大学,军代表取消了边政系和社会学系。此时,原边政系的老师徐益棠先生获悉浙江大学招收研究生,专业就是人类学,导师是吴定良先生,便鼓励我去杭州应试。报考的条件一是要提交一篇论文,我在一个月就把论文写出来了,内容是彝族的文化特点。通过了外语考试后,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我踏入浙江大学后不久,导师换成了夏鼐先生。当时夏鼐先生没有去台湾“中央研究院”,而留在浙大任教。夏先生教史前史和考古学,而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幸运。担任研究生课程的名师还有沙孟海、吴定良等先生。沙先生讲的是金石学,他总是把讲的内容用毛笔小楷抄一式两份,其中一份给学生。一般人只知道沙先生以书法名世,其实他还是古文字学家和古器物鉴定专家!我把当年沙先生的讲义珍藏至今,对沙先生一直有一种尊敬和敬佩之情。1949—1950年为实习期,即除完成导师所开书目的自学外,还要参加考古发掘的实践。我们当时发掘的地点在杭州玉泉山,这是一座晋墓。实习结束后,才由导师挑选他满意的学生;当然,学生也有选择导师的机会。我选择了夏鼐先生为导师,通过考古实习,我明白了做人、做学问和工作方面的道德和修养。夏鼐先生为人正直,治学严谨,严于律己,其道德修养和为人处世都对我日后的学习、生活、做学问等方面有很重要的教导意义。是夏鼐先生一步一步地将我带入了考古的殿堂,让我明白了自己必须注意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这样也就少了一些良心的自责。而这与做学问是同等的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1950年初,中国科学院筹建考古研究所,夏鼐先生奉命北上。同年9月15日,我也随后来到北京,被聘为助理员,一同参与筹建工作。当时的聘书还盖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大印。

1950年秋,全考古所工作人员在夏所长领导下,去河南辉县发掘。辉县琉璃阁的发掘,我、王仲殊、安志敏和王伯洪四人为骨干,分别负责琉璃阁和周围村两地的发掘工作。琉璃阁主要是商代中、晚期的墓葬群,这是继安阳殷墟之后在中原地区最早发掘的一群商代墓葬,为研究盘庚迁殷前的商文化面貌提供了可靠的信史资料。周围村的考古工地发掘的是战国中期魏国王族墓地,对考察当时三晋地区高级贵族的葬制具

有重要的意义。这次发掘和研究的成果,反映在后来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辉县发掘报告》中。

1951年秋,我刚刚领队在北京颐和园发掘了董四墓——两座明代妃嫔墓葬后,马上与王仲殊、安志敏一道随夏鼐先生去了长沙。正是这次长沙之行,发现和发掘了子弹库楚墓。1942年在这里盗掘出土了战国时楚人的文字资料,即楚帛书,又名缙书,即以白色丝帛为书写材料的文字史料。两年后,其摹本就被蔡季襄收录在《晚周缙书考证》一书中。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再次发掘了这座墓,判明其年代在战国中晚期之间。这次长沙之行,除子弹库楚墓试掘之外,还在长沙市郊发掘了许多西汉、东汉的墓葬,发掘的成果都汇集在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长沙发掘报告》中。

1952年下半年,全国考古培训班开学。这是为配合全国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必须尽快培养一大批考古发掘人员而采取的举措。一共办了四期,后来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置了考古专业,考古培训班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便是考古界的“黄埔军校”。我参与了第一、第三期的讲课和指导实习的工作。

1953年,我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实习,在西安沣西、华阴李家崖等地做了一些调查发掘工作。同时,在考古调查中发现了半坡遗址。

1954年下半年,我带领第三期考古培训班发掘实习地点就是半坡遗址和墓葬。半坡遗址和墓葬前后揭露1万平方米左右,这么大面积的揭露,在我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第三期考古培训班的实习结束后,半坡的发掘仍继续下去,一直持续到1957年成立半坡博物馆为止,我一共主持了前后五次发掘。

1956年以后,直到1959年,我被任命为考古研究所所务秘书,协助所长处理有关业务方面的事,相当于后来的所长助理。

1957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下设的长江流域考古队成立。考古队总部即直属队在武汉办公,下辖14个分队。考古涉及的范围有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陕西和青海。我担任直属队的队长,“黄埔三期”的学生张云鹏和陈淮副队长协助工作。直到1960年,我才离开长江流域考古队直属队。这几年最大的收获是发现和部分发掘了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和青龙泉文化。在考古上做如此大跨度、大面积,多种考古文化的调查、试掘和发掘,实在是后来者不可多得的机遇。行行重行行,我在万里奔波中获得了考古文化纵横比较的感性认识。虽然辛苦但还是感到非常欣慰,因为实在是机会难得。

1958年“大跃进”的热潮中,陕西省科学院成立,下属的研究所中便有考古研究所。1961年,我来到了陕西工作。到陕西还没几年的时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的波及下,我的考古研究以及考古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这段特殊的岁月里,我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停止田野考古发掘。每当蜗居家中时,我便闭门读书,梳理自己未思考完的、前人未解决的问题。我聊以自慰的是,在那8个月限制行动的时间里,安静地读了《列宁全集》18册(11册—28册),多少对列宁主义有了较多的认识。心中有一个信念,就是明天很快就会到来。

1970—1975年,“文革”到了尾声,盼望多年的考古发掘总算盼到了!我开始主持发掘杨家湾汉墓,这是西汉文景时期汉高祖长陵的陪葬墓,有人依《水经注》所记方位,推测是汉初名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墓葬。1962年,西安考古界决定发掘西汉周勃墓。在这期间开始对咸阳原西汉九陵的勘查,澄清了诸陵的方位及其排列顺序。杨家湾汉墓的发掘,是整个咸阳原九陵的勘查的一部分,它与随后的考古发掘证实了《三辅黄图》、《水经注》、《汉书》臣瓚注、唐《元和郡县志》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排除了咸阳原上有西周王陵的可能性。

我在主持发掘杨家湾汉墓的五年期间,还穿插了几次其他的考古活动。1973年秋,趁长江流域第三期考古培训班结束之机,我与陕西几位同志到长江中下游各地做了一次较长时间的参观考察,对长江流域史前文化有了较多的了解,并与黄河流域文化做了比较。经过深思熟虑,并从民族文化史的角度做了整合考察,脑子里初步形成了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可以三大板块来加以概括的认识和观点。

另外,1972年发现了兵马俑坑,1974年开始发掘。那时,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负责秦俑坑的发掘。

1976年,我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刚一回来,马上就投入位于山西沁水中条山主峰历山山腰的一个山间小盆地的下川遗址的发掘。这是全国首次发掘的中石器时代的遗址。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中间环节。而且在此之前,石器工具单一,下川则首次出现了复合工具,这是工具史上的伟大革命。对下川遗址的发掘,我感到惋惜,因为没有继续发掘下去,那里的文化埋藏没有全部揭开。据目前揭露所知来推测判断,那里山洞中应该有人类遗骸和原始壁画。下川遗址的发掘报告已整理完成,正在修订中。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始招收研究生了。我是首批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史前考古。王仁湘、吴耀利是我最早的研究生,后又招了袁靖。现在王仁湘、袁靖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吴加安、吴耀利是中国文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们都发表了不少很有分量的考古论文。袁靖在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已令人瞩目。他们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如吴加安现任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

1980年,我带领研究生到长江中下游参观实习时,在南京、杭州和合肥做了学术讲演,谈的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体系问题,当时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同年11月在武汉召开的第二次考古学年会上,我做了专题报告,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将全国新石器文化分为三大板块,考古文化、生态条件和历史民族文化相整合。随后,苏秉琦、佟柱臣、严文明、张光直四人也发表了各自的中国史前文化类型区域的分法,与我的分法基本一致,只是在具体文化区系的划分上略有出入,大同小异,各有千秋,因为各自依据的条件和采取的角度不同。

1984年以后,我又回到了陕西。当时陕西新任副省长孙达人和陕西社科院院长郭琦通知叫我回陕西,统一陕西的考古工作。第二次回陕西,我被委任为陕西省社科联常务理事、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陕西省文物局学术委员会主任、陕西省考古学会会长、秦文化研究会会长、三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黄帝陵基金会副会长、轩辕黄帝研究会副会长。我不仅要参与这些社会活动,而且是非常认真地去写发言稿或相关的论文。

我还担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任人大代表期间,我提出关于“几所大学可合并为一所综合性大学,不同的研究门类可在大学下设学院”的提案,获得了通过。我提出制订“大学法”议案,对加强大学教育很有意义,对提高学术水平关系很大,而且讨论通过。

“文革”以后,我意识到必须抓人才的培养,其次才是对一些考古问题应当有更高层次的思考和认识。带研究生自然是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还有不能上研究生的更多的年轻人,要为他们的考古发掘和科研条件提供更多的方便。凡中外考古界的名人有来西安的,我尽力请来讲学,以扩大陕西考古界同人视野。如1984年9月25日,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来陕西考察周原遗址,我便请他来陕西省考古所做《当前美国和英国的考古概况》的学术报告,并通知省市文博单位派部分人员一同来听讲,使封闭30多年的考古界第一次较全面地了解到国外考古学发展的概况。

二次来陕西工作的这些年,虽然身负重任,但还不忘下田野去发掘。大的项目即有开展周原遗址发掘、秦俑坑二期发掘、法门寺地宫的发掘,都曾有轰动中外的考古新发现和新成果。

从1979年起,我先后应邀或被派赴希腊、罗马尼亚、美国、中国香港、法国、埃及、印度、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和考察。1986年,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我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逗留三个月,其中半个月就走遍了美国西部八九个州,行程两万公里;并在东部几个繁荣地区做了两个月的考察,做了多次讲演。多次出

国考察,在交流中使世界学者更多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成果,以及它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对中国考古与文化有正确全面的认识。同时,我也更多地了解了世界的文化和考古状况,扩大了视野与认识,从而更容易地融入世界考古学发展的大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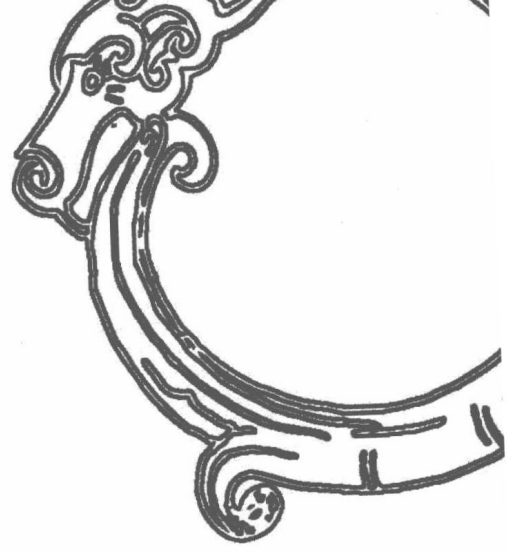
我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卸任至今,一直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名誉所长。虽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我还是对中国考古学尤其是陕西考古学的发展寄予厚望,我也一直在关注着陕西考古的发展与成果。

我从事考古至今,所涉及的研究方向较多,本卷选收的文章多是我历年所发表各类论文,论文的内容涉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隋唐等各个时代各方面的研究。文章包括了考古学研究中的理论、方法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包括了农业考古、民族考古等各方面的研究,研究的地理范围从中国西部到东部、南部到北部,范围广阔。这 28 篇论文在我所有研究论文中涉及内容较为广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石兴邦口述

王叶整理

2011 年 11 月于西安



目 录

- 001 / 中国氏族社会考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与方法问题
- 034 / 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及其史料学与方法论
——为纪念尹达同志诞辰八十周年而作(石兴邦 周星)
- 056 / 中国的“细石器革命”及其有关问题
- 083 / 下川文化的生态特点与粟作农业的起源
- 105 / 中国人种与族系的形成和发展
- 126 / 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辩证的发展过程及其源流的考察
- 158 /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与生态环境的考察
- 181 / 前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
- 212 / 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
- 226 / 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
- 265 / 中华龙的母体和原型是“鱼”
——从考古资料探“中华龙”的起源和发展
- 279 /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
- 301 / 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
——纪念摩尔根逝世 100 周年
- 331 / 黄河上游的父系氏族社会
——齐家文化社会经济形态的探索
- 344 / 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
——我国国家形成过程史的考察(石兴邦 周星)
- 368 / 我国奴隶制国家形成前夕的社会经济形态
- 378 / 西周文化与文明形成的考古学探讨
- 388 / 论“炎黄文化研究”及有关问题
- 399 / 女娲氏族探源
- 407 / 黄帝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 420 / 有关东南沿海与珠江流域氏族部落文化的一些问题(摘要)
- 431 / 河姆渡文化
——我国稻作农业的先驱和“采集农业”的拓殖者
- 443 / 陕西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珍宝的发现及其价值

467 /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逻辑概括

482 / 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1 世纪中国考古学谈论之一

489 / 中国文化与文明发展和形成史的考古学探讨

518 / 保“根”重“源”

——现在我们应重视民族文化遗存的保护和研究

525 /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研究》导论

583 / 编者感言

中国氏族社会考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与方法问题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尹达同志提出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任务是研究中国的氏族社会历史,为大家所接受,将近半个世纪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论在理论、方法或文化系统方面都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在世纪之末,需要做一回顾和概括。在这里,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论述。

一、将近半个世纪来,新中国考古研究工作的简单回顾

自从以田野考古为园地、以物质文化遗存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俗称锄头考古学)诞生后,世界范围内的古代史研究的科学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掀起了一场意义深刻而影响深远的革命。因为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大大拓展了历史科学的范围,延伸了不止数千百倍的人类活动的时代跨度,层层不断地揭示出地下文化层中的历史文化蕴蓄。从东亚到西亚,从北非到欧陆,从旧大陆到新大陆,以及人类活动过的海洋岛屿,逐步地解开了一个个历史之谜,一座座、一片片旷世伟迹及文化珍宝显露于世,显现出人类不可思议的伟大创造力和思维世界的奇迹。这些发现,不断地充实着历史的内涵,改变着历史的面貌,多多少少改变和指导人类历史发展前进的理论导向。

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宏阔的历史视野,使我们能够瞭望到洪荒远古的史前时代,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年前人类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和景象,重现消失在荒古时代的历史画面、农业革命的发展过程和文明产生时代的历史图景。许多在人们脑海中那些模糊而又具体的历史传统和神话传奇,在考古学家的锄头下,显映出真实的历史素地。缺失的得到了补充,错误的得到了纠正,从而恢复了历史真迹。

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范围及层面在日新月异地进步、扩展和深入,人类历史的轮廓和面貌也显露得更清晰、全面和真实。特别是在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探索中,不断地扩展、宏富着历史画卷。因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能在较深的层次和较广阔的范围内,入微地探索与考古学文化相联系的有关问题,对考古发现的各种标本(文化的或自然的)进行多学科鉴定、分析和研究,其取得的成果,不断地丰富、充实考古学研究的内涵,拓展研究方法和范围。从人类文化的史证到与文化相联系的生态环境、动物群体及生化系统的各个方面,从理论到实践,都为考古学的整体发展、全面地恢复古代历史提供了新的领域,能使人类文化面貌更全面、更充分地显现在我们面前,达到文化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历史与逻辑的发展整合。

所以,现在各国,特别是古代文明国家和现代技术发达的国家,相当广泛地利用考古学方法和手段,研究解决古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甚至涉及自然史方面的问题。

现代考古学是20世纪30年代才引进中国的,我们的先辈做了不少开拓和奠基性的工作,也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涉及中国古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但由于时间短、底子薄,只是揭开了中国古史的部分层面,不论在材料的积累方面还是问题发掘的深广度方面,都有很大的局限。

在50年代,在血和铁的百年洗练中,复苏起来的中华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革。历史的辩证法,促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特别是在急剧变化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考古学的崛起和在历史科学中所占地位的界定是学术界一大特色。考古学所以机逢盛运,其一,是由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需要考古学的阐明和解决,如人类起源问题,农业革命问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其二,是高涨的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及文化事业的发展,要求提供更多的形象生动的实际证据以充实丰富民族文化内涵,而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之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其三,国家的基本建设,特别是在重要历史文化区(华夏文化区)的建设,许多珍贵的地下文物宝藏,需要考古学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始能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考古学便以古老而又年轻的新兴学科跻身于现代社会科学行列,成为新中国历史科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作为一个独立而独特的社会科学体系卓立于文史领域,成为阐发史学理论和弘扬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

考古学的历史使命,明确宣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调查、发掘和研究物

质文化遗存,以复原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特别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和记载简略的古代社会历史,以揭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我国有如此悠久而深厚的(百万年以上)历史文化沉积,近一千万平方公里广阔而复杂的涵盖面积,要将这一部埋藏地下的宏伟而深厚的“地书”发掘整理出来,确实任重而道远。

由于我国有悠久的文化和文明历史以及特具的人文科学内涵,很早就有研究古代文物的传统,即金石学传统。虽然金石学具有考古学研究的一些属性,但只限于文化类型品的个案研究,从整个社会机体来说,那只是一鳞半爪,离复原社会历史距离尚远。

在这样有限的工作和薄弱资料的基础上,要完成复原中国历史的面貌是很难的。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站在时代前列并承担重任的历史文物与考古界的老前辈郭沫若、郑振铎、尹达、王冶秋、梁思永、夏鼐、向达和裴文中诸先生以及文博考古界的一些前辈,审时度势,建立机构,培养干部,开展工作,提出建立体系的宏伟构想,并付诸实施。特别是尹达主持考古工作期间,尤其重视考古学理论的研究和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立。要完成复原中国古史的繁重任务,首先要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指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体现多民族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特色的和反映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物质文化体系。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是年轻而富有活力和潜力的学科,完善地建立起它的体系,才有望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考古界的同志是把建立考古学体系作为崇高的历史使命来完成的,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探索追求,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理论体系、方法论体系和文化发展体系三部分构架而成的中国考古学体系,同时大家也在继续不断地完善这个体系。

在这个体系结构中,氏族社会即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研究,最为大家所注目,成果也最显著,解决的问题不少,提出的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更多。因此,不论是在理论、实践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需要我们拓展和深化,为本质地解决问题提供条件。

我这里不是论述已经形成的体系内涵,而是就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需要我们深化研究及注意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一孔之见,以期有利于具体实践。

二、氏族社会考古研究目前需要重视的几个理论与方法问题

(一) 强化理论指导的意识

氏族社会研究,是理论性较强的一门学科。揭示氏族社会的历史画面的图像和问题,需要锐利的思想武器,就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理论指导包括两个层面:一个

是指导思想的主体层面,就是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另一个是支体层面,是对客观事物科学研究而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和结论,并上升为指导实践的理论。

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严密而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不是情有独钟,而是在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中做了科学的比较而做出的合理选择。西方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学派或学说来研究,我在大学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时,教授就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思想。在学习政治学时,我记得由吴恩裕先生讲授,他简略地说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主要介绍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而且说明主要是由恩格斯来阐明的。他们各人只讲各人学科关涉的部分,但都回避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的这一科学事实。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人类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矛盾斗争与转化的整体联系,自从单元论的人类祖先出现后,在不断繁衍和析居的发展过程中,栖息于不同的生态环境,相应地就有了不同的谋生方式,形成了不同的体质和肤色,出现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模式,不同的追求、信念而形成殊异的生活习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最后在相互之间为你群、他群和我群的利害和信仰发生的矛盾和斗争中,产生了各自的国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形形色色的变异为前提的,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和整个人类之间还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发展的聚积和规律性所在。自古以来,为了揭示这个奥秘,许多学者潜心研究这个问题,做出了很多贡献,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创造一个完美的学说体系——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要彻底揭示这个奥秘,只有依托它的帮助,才能达到目的,因为它是揭示事物发展彼此联系而又符合规律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对人类文化所做的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它那完整的科学体系是史学领域内的一个革命。至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西方社会史领域中的学派和思想体系,没有一种历史理论在科学性方面可以取代它的地位。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千百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实践与考验,证明它的智慧之光和科学预见仍然光辉灿烂;即使在现在西方史学家的评论中,也不能回避这一点。美国著名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的导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明显地影响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他们的视线引导向历史中的经济因素,引导他们研究被剥削者和压迫者,但是马克思对现代史学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强调了社会作为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关系的整体而运动的思想,以及力图找到历史现象在其中发生的结构要素,把这些同生产